

新时代先秦、秦汉史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杨 博

新时代的先秦、秦汉史研究，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总体命题下，已经走出一条田野考古与文献考据并重、以唯物史观为指引、以多学科协作为手段的新路，呈现更加平和而开阔的学术气象。唯物史观在本土经验滋养下的持续深化，中华文明长时段演进框架的系统阐释，以及历史学、考古学与其他学科深度融合带来的方法论革新，共同推动了先秦、秦汉史研究从“材料补史”跃升为“理论塑史”，为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学术支撑。

一、唯物史观的本土化理论突破

新时代先秦、秦汉史研究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社会研究中的深化提供了关键实证，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进展。

首先是对社会形态演进序列的确证与重新检讨。山东傅家遗址首次证明了黄河下游母系氏族社会的存在。该遗址南北墓区人群呈现高度一致的母系遗传特征与高度异质的父系遗传多样性，结合跨墓地亲缘网络及“随母系埋葬”的葬俗，确证了两个母系氏族通婚共存的稳定结构。墓地延续时间超过250年，充分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的“母系血缘纽带与社会共同体并存”的社会图景。^①对来自石峁核心遗址、周边聚落及晋南地区共169例古代人骨开展的古基因组分析，首次成功重构了石峁遗址内部横跨四代的家族谱系，表明石峁社会已形成以父系血缘为核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冷门学科资助计划（编号：25JXLM06）、“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编号：G3441）资助。

^① 参见张杰、张清俐：《中国学者首次实证4750年前母系氏族存在 为理解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提供新解释框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6月9日。

心、女性外婚制为特征的具有严格社会等级的社会。^① 两处遗址的工作反映出文明演进的非均衡性，傅家代表相对平等传统的母系共同体，石峁则展现父权催生的早期国家雏形，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提供了具体例证。

其次，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同样获得了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再阐释。西方旧说将冶金、文字、城市三要素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硬门槛，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实践表明，超大型都邑、礼制器具与公共工程同样可以体现社会剩余价值的集中与再分配，其核心是国家形态的出现及其物化表征。^② 具体而言，以良渚、陶寺、石峁等为代表的都邑性遗址形成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并出现大型礼仪建筑，彰显王权与神权的结合。社会结构呈现显著阶层分化，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玉器、青铜礼器等被上层垄断，形成“器以藏礼”的等级制度；墓葬规格悬殊，显示阶级固化。经济上依托规模化农业和跨区域资源调配，支撑复杂社会运转。精神领域形成以兽面纹、玉龙等符号为代表的原始信仰体系，以及结合天文历法的礼制雏形，奠定“天人合一”宇宙观和“家国一体”的社会治理基础。^③ 这些标志以国家公共权力的形成为根本，揭示了中华文明史上多元一体、连续发展的文明演进路径。

最后，理论创新兼具宏观阐释与微观实证，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提供可靠支撑。学界跳出传统王朝史框架，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深化了对秦汉国家与社会形态本质的认知。^④ 例如，通过简牍等出土文献与传世史料的互证，系统剖析秦汉土地制度、赋役体系及官僚结构的

① 参见薛家阳、陈泽慧、平婉菁等：《古基因组研究揭示石峁遗址人群的遗传来源与社会结构》，《遗传》中国知网网络首发，2025年12月5日。

② 参见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第5~32页；王震中、夏虞南：《中华文明形成标志的重新界说——兼对“古国”等概念辨析》，《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第23~45页。

③ 参见刘庆柱：《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82~99页；戴向明：《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3页；魏兴涛：《中华文明起源路径与模式的中原考古观察》，《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66~187页；李新伟：《“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考古》2025年第1期，第3~11页。

④ 参见卜宪群：《秦汉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论稿》，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演变规律，阐释经济基础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塑造作用。^① 聚焦多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机制，如依托长城地带考古实证与边疆治理政策再评价，阐明农耕与游牧文明通过郡县制整合、“书同文”文化认同实现的碰撞融合，^②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历史理论基础。里耶秦简等史料新发现也推动基层社会研究取得突破，如剖析乡里组织与血缘地缘共同体在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中的互动，以及“流动中求稳定”治理形式的形成，^③ 既深化了对秦汉社会本质的理解，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新范式。

二、中华文明长时段演进框架的明晰

新时代先秦、秦汉史研究在中华文明长时段演进框架下取得全新认知，从三个历史维度重塑了中华文明演进的科学体系。

第一是百万年人类史，实证中华大地人类活动连续性。中华古人类在华夏大地上的演化历史可追溯至 200 多万年前，从直立人开始，生生不息，绵延至今。^④ 湖北学堂梁子遗址出土的“郧县人”头骨化石（距今约 100 万年），完整呈现了直立人在东亚的生存形态；^⑤ 山东跋山遗址发现的古菱齿象门齿加工工具与石器工具，显示出 10 万年前古人类对巨型动物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他们应对黄淮海地区晚更新世环境变迁的适应策略。^⑥ 这些发现将中华大地人类活动史延伸至地质年代尺度，为中华民族的深层根系提供了实物证据链。

① 参见晋文：《秦汉土地制度研究：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

② 参见王绍东：《农牧交辉：多维视角下的战国秦汉时期北方长城》，中华书局 2021 年版；张旭：《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3 期，第 4~21 页。

③ 参见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王准：《战国秦代的乡里组织与地方社会：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④ 参见高星：《探索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远古根系》，《历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32~43 页。

⑤ 参见华杰群、葛俊逸、陆成秋等：《湖北郧县学堂梁子古人类遗址年代学研究进展》，《人类学学报》2025 年第 2 期，第 316~332 页。

⑥ 参见李罡、尹纪亮、刘禄等：《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发掘记》，《大众考古》2022 年第 11 期，第 19~28 页。

第二是一万年文化史，揭示农业起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山东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多处火塘，清晰展现了一万多年前人类社会从流动到定居、从石器到陶器、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从狩猎采集到广谱经济的历史转变过程。^① 浙江上山遗址普遍发现水稻栽培、收割及加工的遗存，构成了稻作农业万年起源的完善证据链。^② 河北四台遗址发现 7600 年前的粟作遗存与半地穴式房址，反映了北方旱作农业的早期形态。^③ 山东后李文化至岳石文化的完整谱系，有助于明晰粟作农业技术的连续性发展。

第三是五千年文明史，解码早期国家形态与礼制基因。其中，礼制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取得标志性进步。在制度文明方面，甘肃南佐遗址距今 5100 年的都邑性聚落（面积达 600 万平方米），其“宫城”建筑与夯土台基昭示区域文明的复杂化进程；^④ 滕州岗上遗址发现距今 5000 年的城垣与棺槨制度，是早期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程度的鲜明标志。^⑤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展现夷夏族群交融场景。^⑥ 里耶秦简、胡家草场汉简等出土简牍与城址考古相互印证，使秦汉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精度显著提升，基层行政运作、律法实施等微观机制得以立体呈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也在同一框架内展现出可追踪的轨迹。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与长江先民已出现双向的人群互动，但遗传差异并未随时间扩大，反而在龙山阶段显著缩小；^⑦ 这与考古学观察到的“陶器纹饰趋同”“玉器形制共享”现象互为印证，提示文化—人群双重融合机制的存在。从西周金文“宅兹中国”、春秋战国“诸夏”称谓、秦

① 参见赵益超、孙倩倩：《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2023 年发掘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2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7 页。

② 参见蒋乐平、韩泽玉：《万年奠基 稻启华夏——上山文化改写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国文物报》2025 年 9 月 27 日。

③ 参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 年第 7 期，第 14~28 页。

④ 参见韩建业、张小宁、李小龙：《南佐遗址初识——黄土高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文物》2024 年第 1 期，第 67~75 页。

⑤ 参见孙丛丛：《山东滕州岗上遗址：海岱地区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化报》2022 年 6 月 16 日。

⑥ 参见高明奎：《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大众考古》2016 年第 4 期，第 14~15 页。

⑦ 参见吴苡婷：《填补黄河、长江流域关键时期遗传史空白》，《上海科技报》2025 年 8 月 29 日。

简“中华”记录到秦始皇“筑长城，界中国”，共同构成一条由空间认同到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再到政治认同的递进线索；^①而出土简牍所见的“荆”“夏”“越”“蜀”“巴”“濮”“苗”“杨”等，显示秦统一后地方族群虽仍保留自我身份，却已被纳入同一户籍与律法体系，从而铸就了“多元”外壳下的“一体”内核。由此出发，研究者强调秦汉王朝通过郡县、律法、度量衡、文字等“基础设施”，将不同血缘、不同习俗的人群转化为法律意义上平等的“编户齐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基底。这一解释路径既延续了唯物史观对“国家—阶级—民族”关系的宏观洞察，也吸收了现代民族学关于“象征边界”的微观分析，使“多元一体”不再停留在描述层面，而具备了可操作的阐释机制。

三、学科融合的方法论体系创新

在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学术视野下，新时代先秦、秦汉史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互动层面。

首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深度融合形成多维研究范式，多学科协作模式的创新重构了研究逻辑。摒弃过去牵强比附的倾向，“分进合击”原则逐渐成为研究共识。它强调考古学与文献史学首先立足各自优势独立研究，在充分积累材料后审慎整合。^②考古发现更多证明了古代真实社会与人类文化的复杂性，补充甚至颠覆了相关文献记载和传统认知。例如，对照考古发现的两周墓葬遗存资料，可以明确文献中的许多礼制记载是出于理想的构拟。^③

其次，阐释维度的深化实现了对文明演进的整体把握，“由已知到未知”的认知逻辑成为重要关注点。依托确证的商文化遗存反推夏文化特征，通过两周曾国考古发现破解“曾随之谜”，共同助推历史语境下考古研究范式的形成。文献史学也为考古发现提供阐释框架，如胡家草场汉简律令与《汉书》

^① 参见晁福林：《从“华夏”到“中华”——试论“中华民族”观念的渊源》，《史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8~16页；杨博：《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52~60页。

^② 参见赵辉、孙英民、方辉等：《多元与开放：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关系的青台思考》，《江汉考古》2025年第3期，第5~16页。

^③ 参见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第189~203页。

记载的汉初律法改革形成制度性印证；^①走马楼西汉简记述的长沙国民族及其社会生活，生动展现了长沙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②

最后，史料处理范式的革新突破了传统文献的局限，多源互证体系日趋成熟。通过科技手段将物质遗存转化为可解读的史料，如对琉璃河遗址碳化种子的浮选分析还原了西周燕地的农业结构；^③青铜器矿料溯源技术则重建了商周时期的资源流通网络，均显著拓展了史料边界。^④海昏侯墓出土器物与《汉书》记载的互校，不仅验证了文献细节，还通过孔子镜屏、错金银车马器等实物再现了汉代贵族生活场景。此外，图像学介入思想史研究，从汉代画像中解读信仰传播与社会观念，亦值得关注。^⑤这些“小切口、大纵深”研究路径，使早期国家治理、法律体系及基层社会形态的复原更具立体感。

方法论体系创新使先秦、秦汉史研究超越“证经补史”的范畴，构建起具有自主话语体系的古典文明阐释框架。通过多源史料互证、时空框架重建与社会进程分析，既厘清了三代礼制向秦汉制度的转化机制，又为理解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学术支撑，彰显先秦、秦汉史研究在文明溯源与当代启示方面的双重价值。

展望未来，先秦、秦汉史研究仍面临三重挑战。第一，理论层面需要把“中国经验”进一步概念化，使之能够与“早期国家”“王国/帝国”等既有学术范畴对话，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例外论”的自我陈述。第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审慎引入与合理应用。海量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与陶器、金属器等出土文物，均有待科技检测与大数据处理，如何建立跨机构、跨学科、跨语言的开放数据库，避免“数据孤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研究深度的关键。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① 参见陈伟：《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76~88页。

② 参见王博凯：《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民族及其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第109~123页。

③ 参见李祺瑶：《琉璃河遗址新发现佐证“周初封燕”》，《北京日报》2021年4月2日。

④ 参见陈建立、张吉、方勤等：《金道锡行——简论商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金属流通网络》，《江汉考古》2024年第5期，第11~23页。

⑤ 参见刘中玉：《历史研究中的视觉性实践》，《史学月刊》2025年第1期，第115~124页。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的设立，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第三，在方法层面，必须警惕“技术万能”倾向。碳十四、分子古生物学只能回答“何时、何地、何物”，而“为何、如何”仍须回到历史学的语境分析与价值判断。

应对这些挑战，学界一方面需要继续坚守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人群与环境的适应机制为提问起点；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视野，积极吸收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生态学的理论工具，在“中国案例”与“世界比较”之间建立可互通的分析框架。这样，新时代的先秦、秦汉史研究才能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工程中，既不失本土之“根”，亦具世界之“眼”，为理解人类文明多样性与统一性提供更为丰富、细腻、持久的学术贡献。

近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之概观

楼 劲

近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方面承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系列新生面，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新趋势。这两个方面并行发展、相互影响，后一方面是在前一方面发展基础上，因时代、学科等诸多要素风云际会而出现的。

承续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态势的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的集成式整理研究和专题化开拓解读；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和国际学术交流的空前活跃；职官、礼法、户籍、财政等各项制度研究的显著发展；佛、道等宗教及经学、玄学、子学、史学、文学、术数等思想文化研究的较大推进；衣食住行、环境生态、医疗疾病等社会生活史和边缘人物、弱势群体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五大突出进展，也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断代史研究具有较大共性的部分，体现的是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历史运动，更为具体切实地认识历史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态势。令我们引以为豪的是，这些年来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古史研究影响较大的成果：从职官、礼制、法制及户籍、财政等制度研